

当代伦理学文库

第2辑

DANGDAI
LUNLIXUE
WENKU

经济、环境与文化

曹孟勤
卢风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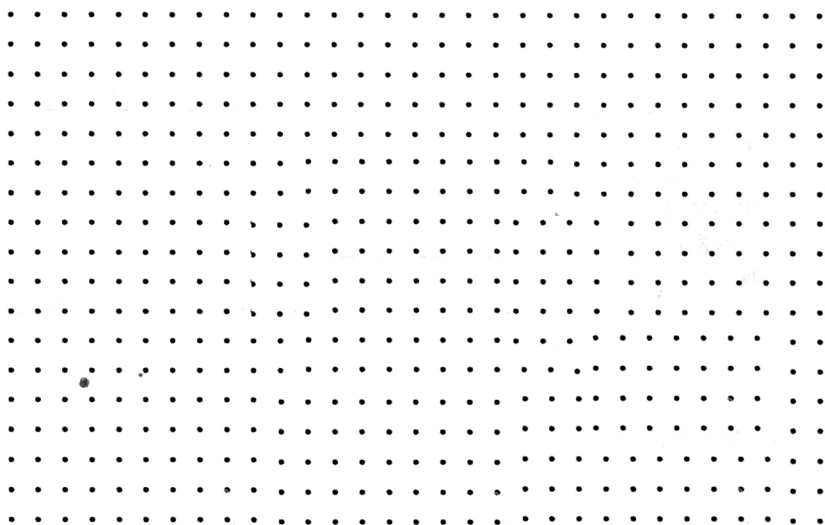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当代伦理学文库

第 2 辑

经济、环境与文化

曹孟勤 卢 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环境与文化/曹孟勤,卢风主编.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当代伦理学文库.第2辑)
ISBN 978-7-5651-1093-1

I. ①经… II. ①曹… ②卢… III. ①经济学
—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9385 号

书 名	经济、环境与文化
主 编	曹孟勤 卢 风
责任编辑	王 瑾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文丰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97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1093-1
定 价	22.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序一

王小锡

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学术对话会已经举办了两届。第一届对话会于2011年5月28日至29日在清华大学召开,此次对话及其后出版的题为《资本、道德与环境》的会议论文集在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2年6月9日至10日,第二届对话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如期举行。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近20位专家、学者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实现了“倡导平等交流、创新特色学术”的预期目的。会议主持人卢风教授和曹孟勤教授主编了这本题为《经济、环境与文化》的会议论文集,展示了此次会议的学术成果,我乐意为之作序,并诚恳推荐给学界同仁。

经济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可谓是近年来应用伦理学研究中探讨最为热烈、成果最为丰硕的两个领域。它们既是平行的两个三级学科,又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相互交叉和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两者既有相通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又有不同的学科视野和理论资源。这种共性与差异并存的特殊关系在此次高端对话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学者们在对话过程中既有共同或互补的学术话语,又有针锋相对的学术争论,这对经济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学术进展和学科发展将起到独特的推动作用。相信这种形式的学术对话会将成为我国学界有影响的特色学术交流活动,并在伦理学学术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两届高端对话我都参加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会议体现出的几大特色。一是人员少而精,议题集中。每次讨论只针对一个主题,与会人员或者是长年研究经济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的专家,或者是擅长研究会议讨论主题的学者,因此,每次讨论都产生了明显的学术效果,并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二是观点深而广,讨论热烈。由于会议学术宗旨明确,故讨论和交流



有相当的深度,加之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视域和专业视角,所以,对同一议题的讨论理路广泛,能形成较为系统的学术理念。三是时间短而紧,效果凸现。两届高端对话,由于参会人员预先准备充分,会议时间安排紧凑,因此,都能高效率地达到创新学术成果的预期效果。我相信,此类学术交流形式会有很强的生命力。

其实,学术并不高深莫测。遵循此类高端对话的理念、路径和方法,确立致用宗旨,静下心来,认真构筑最高最新学术信息平台,面向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老实地钻研和解决一些问题,就一定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学术成就。那种把学术观点忽悠成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所谓理念,甚至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想着法子故弄玄虚的所谓理论研究,哪怕包装着漂亮的学术语言,终究也只会昙花一现,成为没有生命力的“伪学术”。因此,我主张要多办像“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对话会”这种体现“顶天立地”研究路向的学术交流活动,且要办出风格,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当然,这样的学术对话会议要不断办成“高、精、尖”的学术研讨会议,规模尚可扩大一些。会议已经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今后,还可以积极邀请一些实际工作部门、决策和管理部门的专家参加,并尽可能邀请国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加盟,真正形成两院(系)搭台,中外学者共同“唱戏”的世界性、高层次学术交流形式。

在此要感谢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对“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对话会”的大力支持。感谢卢风教授和曹孟勤教授为对话会的成功举办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同时,还要感谢以各种形式给予会议支持和积极参会的专家、学者,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这高端对话会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祝愿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对话会”越办越好。

是为序。

2012年9月10日

(王小锡,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伦理学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二

卢 风

2011年5月,在万俊人教授的积极支持下,清华大学哲学系举办了第一届“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学术对话会议,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于2012年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题为《资本、道德与环境》。

2012年6月9日至10日,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哲学系在南京共同举办了第二届“经济伦理与环境伦理”高端学术对话会议。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王小锡教授给予此次会议大力支持,曹孟勤教授及其学术团队为组织、举办此次会议付出了辛劳。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近20位教授就如下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对话和讨论。

一、经济正义与环境正义

王露璐教授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先发优势愈发明显,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至于“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无论是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还是进城的农民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的权益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面对当前城乡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凸显的状况,罗尔斯所强调的向“最少受惠者”倾斜的分配正义理论,可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益启迪。针对长期以来多种因素所形成的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政府应当通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土地制度改革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方式给予农民以足够补偿,使已成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和成果。我国还出现了“城市环境好转,农村环境恶化”的趋势,环境正义问题已不可忽视。目前,我国绝大部分污染防治投资都投在城市,城市居民享有的环境资源优势明显大于农村,农村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的建设资金,环保设施严重缺乏。农民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权、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环境侵害的申诉权都没有法律保障,政府应通过制定公平完备的法律体系,实现城乡环境资



源和环保责任的公平分配。总之,在财富增长和环境污染并存的今天,我们不仅要谋求经济正义,还必须谋求环境正义。

人们通常都不希望把污染物放在自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谋求环境正义的人们要求污染物不放到任何人家的后院(Not In Anybody's Back Yard)。但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污染物。按目前的发展模式,我们发展得越快,污染物越多。污染物不能放到任何人家的后院,那么该放到何处去呢?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那便意味着放到野生动植物家的后院。这样会导致生态破坏。可见,为维护生态健康,谋求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只讲环境正义还不够,还必须讲求生态正义。

环境正义只涉及环境资源和环保责任在人类共同体内部之不同阶级、阶层、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环境正义研究者通常认为,无须摈弃机械论或物理主义世界观,只要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他们往往仍坚持现代性的核心信念——独断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即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环境污染可逐渐得以消除,缩小甚至消除各种社会不公才是保护环境的关键。但生态学告诉我们,即使消除了各种社会不公,如果人均消费量不减,地球生态系统仍然承载不起 70 亿人的生态足迹。环境正义和经济正义、政治正义一样局限于人类共同体内部的正义。由利奥波德首倡且得到克里考特等人系统论证的“大地伦理”才把正义推广到“大地共同体”。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利奥波德的“大地共同体”理解为地球生物圈。大地共同体内部的正义就是生态正义。生态正义不要求我们像汤姆·里根要求的那样尊重每个高等动物的生命权、身体完整权和行动自由权,但要求我们尊重大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不要求我们实现“零排放”(总体零排放是不可能的),但要求我们把污染物排放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内。

人类共同体内部的正义要求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大地共同体内部的正义不要求我们尊重每一个非人生物个体的“权利”,但要求我们尊重每一物种的生存权。在人类共同体内部,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多行不义必自毙,你把他人赶尽杀绝,他人必以牙还牙。在大地共同体内部,人类若只顾自己发展,而把其他物种赶尽杀绝,则势必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二、经济自由与经济责任

王小锡教授认为,经济自由并不是经济任意行为,而有其内在的依据和条件。要实现经济自由,必须真正了解经济,按经济规律和基本法则展开经济活动。绝对不能错误地认为,经济自由就是经济放任。事实上,放任的经济行为



不是自由的行为,而是限制甚或遏制经济活动的行为。经济自由是与经济责任相一致的自由。要想获得经济活动的自由,经营者必须树立责任意识。因为经营者的所有经济行为都是社会活动,都要在社会的支持下才能正常进行。无视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要求,无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客观上将会破坏正常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合作关系。这样,就不可能得到社会支持。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是寸步难行的。例如,一些食品企业在生产食品时不守规矩,不负责任,任意在食品中掺假,结果不仅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质量和速度,甚至葬送了企业的前程。企业责任还包括环境保护,企业应实现清洁生产,降低物耗和能耗,实现无公害化,以促进环境状况的改善。

现代性把自由设定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包括法律和道德)所限定范围内的任意行为。现代人认为,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得越充分、完全,人类就越自由,认识了必然和能动的实践就是自由。简言之,现代科技越进步,人类就越自由,科技进步为人类不断增加自由选项,例如,空调可让我们在夏日选择清凉,而非如以往那样无逃酷暑炎热;现代生物技术能让无法自然生育的人们生育,而非如以往那样只能听天由命;现代交通和通讯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自由……科学主义者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将越来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环境、制造物品,如在炎炎夏日建一个巨大的溜冰场或滑雪场,在沙漠上建一个超豪华城市……他们认为人类征服自然、控制环境、制造物品以满足自己欲望的自由是有限度的。然而,生态学的问世让我们发现了追求这种自由的危险。现代科技带给人类的自由依赖于机器系统的扩展和矿物资源(主要是能源)的快速消耗,而机器系统的扩展和矿物资源的快速消耗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生态学也明确指出了人类所追求的这种自由的限度——地球生物圈的承载限度,即人类必须把制造物品、改造环境的自由限制在地球生物圈的承载限度内。正因为现代人错误地理解了自由的涵义,才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与现代企业行为直接相关,与人们对经济自由的误解直接相关。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企业的天职就是赚钱,一个合法赚钱的企业就是好企业,赚钱越多的企业就是越好的企业!经济自由就是在法律界限之内的任意行事,甚至包括钻法律的空子。这种企业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如此理解的经济自由也是完全错误的。企业必须为社会承担各种责任。自由不仅是某个界限内的任意行事,更是对各种规律、规范的自觉意识和自觉遵守。在面临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今天,为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企业不仅要遵循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规律,也不要遵循主流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现有的法律、法规,还必须遵循生态规律。换言之,一个企业既要对其所属的社会



(人类共同体)负责任,也要对其所属的生态系统(生命共同体)负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其真正的经济自由。

三、制造与赞天地之化育

肖显静教授对转基因技术以及应用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说,转基因技术像一个建筑工程,它根据人的需要,按照设计图纸,对基因进行切割、加工、拼接、组装、转移,其本质特征是“制造”。转基因技术充分体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的“座架”(Ge-stell)的本质。所谓“座架”即指现代性特有的去蔽方式,它本身不是技术的,而是“对待世界的技术态度”。现代技术创新以发明而不是发现为核心,其总体特征是构造性的(construction)。转基因技术亦如是。转基因技术通过“挑战”、“限定”、“预置”、“摆置”、“促逼”的方式,将生物置于相应的技术进程之中,使其服从于人为的技术法则。虽然这一法则也建立在分子遗传学的科学认识规律之上,但是人们应用转基因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基因遗传的物种限制,改变生物自然进程,“制造”出自然条件下所不可能产生的生物,以服务于人类特定的目的。这是让基因和生物适应转基因技术,而不是让转基因技术适应基因和生物,基因和生物被技术化了。

由肖显静教授对转基因技术的分析,我们可看出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根本区别。

技术显然是人类文明的内在维度,没有技术就没有文明。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文明始终是一种冒险,因为人类从学会用火开始,就偏离了自己在生命共同体中的生态角色了,即一旦学会用火,人类就不再像非人动物那样自然地服从生态规律了。正因为如此,有些文明消亡了,而能长期生存、发展的文明,即十分可持续的文明,就是好的文明。日本学者福泽谕吉认为,文明主要由两个维度构成——智与德,智即智能,德即道德。其实也可以认为文明主要由技术和观念构成。有了技术,人类才能制造工具和物品。有了观念的进步,才有智能和道德,才有技术的进步。技术与观念始终处于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之中。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古代中华文明是非常可持续的,而现代工业文明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因为,古代中华文明的技术是亲自然的、赞天地之化育的技术。中华文明是以农为本、崇本抑末的文明,其技术也以农业技术为主。中国传统农业的农耕技术是帮助农作物生长的技术。帮助农作物生长就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国古代农民不用化肥、农药,更不用机器,故不用煤、石油、铀、钚等矿物资源,他们用自己的体力、畜力和简单的农具,帮助农作物利用太阳能进行光合作用,以生产人类必需品——粮食。以农为本的文明的基本观念



只能是倡导节俭、知足、安分的观念。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观念,儒家不仅要求“食人者”(养活统治者的百姓)节俭、知足,而且要求“食于人者”(被老百姓养活的统治者)节俭、知足。赞天地之化育的技术只能供养少数人的奢侈生活,而决不能供养多数人的奢侈生活。中国古代的技术与理念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可持续性。现代文明中的技术完全不同了。拥抱现代性的人们认为,从发展前景看,现代技术是无所不能的,它能满足人类日益膨胀的物质贪欲,能无限扩展人类的自由。他们还认为,节俭、知足、安分是应予摒弃的落后传统观念,发展、创造、进步、扩张才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合理观念。人人都有享受物质奢华的权利,人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思想创新——的竞争,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就这样,现代技术和现代观念支持、激励现代人永不止息地征服自然、创造财富。这便使人类文明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现代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制造,它允诺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贪欲,激励人们以无限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中国古代技术的特征是“赞天地之化育”,它只能满足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它要求人类把追求无限的冲动指向非物质的文化创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生态学和全球性生态危机都表明,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技术和观念都必须实现一次根本转变,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

四、发展主义、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

郁庆治教授分析、批判了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他认为,发展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发展主义的核心是发展意涵的片面化及去边界化,其实质则是狭隘的经济主义,它将发展的目标、主体、过程和绩效量度都简化为或等同于GDP增加(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与产出)、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的制造与累积)和经济尺度下的社会进步(人均经济收入与物质福利消费的增加及其保障)。发展主义已成为主宰着整个社会政策取向、制度设计的主流社会文化共识。

包庆德教授介绍了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阿格尔认为,“商品拜物教”的直接后果是人的“物化”和人的需要的异化。今天的工业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具有以下特征:①技术规模庞大;②能源需求高;③生产和人口都很集中;④职能越来越专业化;⑤供人消费的商品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在工业社会,人们往往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这恰恰是现代人的异化。之所以称现代人的消费为异化消费,是因为资本



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结构上的弱点致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这一切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又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我看来,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要害都是物质主义。

如果我们不能在当代语汇中删去“发展”一词,就必须合理地界定“发展”一词的涵义。如果你认为“发展”蕴涵“物质财富的增长”,那么根据生态学基本原理,则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物质财富增长意味着汽车、飞机、火车、空调、工厂、楼房等越来越多,也意味着现代化城市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从而意味着人均生态足迹越来越大,留给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且污染物越来越多。当物质财富增长达到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时,继续谋求增长就会导致生态崩溃。“发展”应该涵盖人际关系的改善,如改变眼下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老百姓和官员及富人之间的敌对关系、遏制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等等;应涵盖文学、艺术的繁荣,不仅指文化产业的繁荣,也包括人们仅凭个人兴趣而从事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兴盛;也应涵盖生态环境的改善。总之,唯当把“发展”理解为社会的综合的、总体的改善而不认为“发展”蕴涵“物质财富的增长”时,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如果你认为,社会不能没有市场经济,不能取消“资本的逻辑”,“发展”蕴涵“经济增长”,那就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产业结构。你就不能进一步推定,“经济增长”蕴涵“物质财富增长”,因为以上已说明物质财富不可能无限增长。当物质财富增长达到生态极限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只能体现为非物质经济增长。即“可持续发展”只能蕴涵“非物质经济不断增长”,不能蕴涵“物质经济不断增长”。

现代消费主义的要害是物质主义。现代文化就是用商品体系、商标等级、服务等级、商业化艺术、物质主义意识形态构成的价值等级体系,其“硬件”结构就是“难得之货”的体系。如今,人们就通过自己开的汽车、拥有的房产、戴的手表、提的包、穿的衣服去标识自己的地位、身份、品位。虽然各种商品都极其丰富(如农民工也可拥有手机),但不同品牌的商品的难得程度是不同的,价格就是难得程度的标度,越贵越难得。能消费或拥有越难得的商品,就表明你越成功、卓越、幸福。就是这样一种以“难得之货”为“硬件”结构的价值体系(对应着现代社会的等级结构),驱动着成千上万的人拼命赚钱、及时消费,驱动着成千上万的人绞尽脑汁地出人头地,即由低等地位爬到高等地位,推动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从而推动着现代工业文明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人活着必须消费,但无需不断增长的物质消费。祛除了物质主义,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何谓发展,从而才能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祛除了物质主义,我们才能合理、适当地消费,绿色消费才会蔚然成风。

五、经济与文化

陈泽环教授运用钱穆先生的文化思想论述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经济生活固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手段,不能让它过度膨胀,以至尾大不掉,而由经济来对整个人类文化发号施令(这正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现实)。陈教授赞成钱穆先生的观点:“没有经济基础,影响甚大。但经济水准愈提高,它对人类全部文化体系所能贡献之意义与价值,并不相随提高,甚至会相反地愈降低。”发展经济应该适可而止,其他文化生活如文学、艺术之类,则是积极的,可以无限发展。经济繁荣富强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手段。

但当代多数人(包括许多学者)对经济与文化之关系的理解是颠倒的。当代多数人深受经济主义影响,经济主义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经济行为,经济活动是最重要的活动,经济增长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文化活动(包括政治、科学、道德、文学、艺术)都应该服务于经济增长,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我认为,钱穆先生和陈泽环教授的观点是对的,经济主义是一种严重误导人类文化的意识形态。

钱穆先生认为,“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按照现代性的“逻辑”,你会认为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呓语。但从生态主义的视角看,这是一位思想大师的远见卓识。按照现代性的“逻辑”,你会认为,人类文明就应该像现代文明这样以工商为本,人类文明将沿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轨迹走向人人平等、自由且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人间天堂,将来的科技会越来越发展,人类改造环境、征服自然的能力将越来越强大。但从生态主义的视角看,你会发现,人类文明始终是一种冒险,在过去的几百万年中,有些文明灭亡了;以物质贪欲为精神动力的、以工商为本的现代工业文明是完全不可持续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文明冒险的极致——文明既可能毁于核战争,也可能毁于生态崩溃和气候紊乱。经过巨大灾变之后,人们也许能真正领会生态学的真谛,那时,他们才会明白人类的物质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



六、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性问题

孙春晨教授分析批判了弗里德曼关于经济学价值中立的思想,他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弗里德曼从三个方面为经济学家回避价值判断的立场作了辩护,但弗里德曼的辩护没能为经济学的“价值中立”作出逻辑一致的学理性论证,反而为论证经济学离不开价值判断提供了有效论据。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则表明,每一项经济改革政策都包涵制定者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家不可能没有其价值立场。

科学主义者通常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追求客观性。价值,特别是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与人的主观情感和意志密不可分,价值就源自人的主观世界,所以,科学一旦沾染了价值,就不可能保持其客观性。经济学家最引以为骄傲的就是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是科学研究,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必须追求客观性,经济学为达到科学必须具备的客观性,就必须保持价值中立。这种关于科学客观性的观点植根于现代西方哲学一个根深蒂固的教条: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特南(Hilary Putnam)等杰出哲学家已用十分精细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方法“解构”了这一二分。如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很多语境中,事实与价值都是互相渗透、互相纠缠的,连物理学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摆脱价值的纠缠。在特定语境中,特定意义的价值中立可以成为我们的叙事目标,但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价值中立。

现代经济学直接告诉人们如何做出各种选择,即告诉人们如何选择价值,它怎么可能价值中立?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但它的“科学性”遮掩了它的价值导向。实际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价值导向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它激励人们拼命赚钱,及时消费,鼓励人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种价值导向恰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经济学必须对自己的价值导向有明确的反省,必须摆脱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狭隘视角,才能成为真正以人为本的、益智的科学。

七、机械论世界观对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影响

田松博士论述了机械论世界观对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影晌。田松认为,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彼此关联。价值判断常常建立在事实判断之上。如果伦理相当于价值判断,则自然观就是伦理的基础。若自然观发生转变,伦理会随之



而变。自工业化以来,机械自然观成为主流思想。机械自然观包括三个层面: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根据机械自然观,①世界(自然)是一架机器,由一个个机械连接的部件构成,它是物质的,没有内在的生命,此即机械论;②机器可以分离、拆卸,可以重新安装、重新组合,此即还原论;③机械的运行遵从确定性的规律,可以被确定地计算和预期,此即决定论。基于机械自然观的环境伦理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据机械自然观,自然本身是个机器,是一个物质的集合,不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把自然视为资源,相信自己有能力也有权力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改造。大自然成为人类研究、分析、计算、控制、改造、重构的对象。机械自然观也是当下经济伦理的基础。在工业文明的社会框架下,资本是一切的核心。资本增殖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目标和最高行为准则。效率是经济伦理中的关键词之一。把自然充分还原成一个个基本构件,对自然进行严格的操控,就是最高效获取利润的方式,但也最高效地破坏了自然的主体性,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后现代与前现代常常是平行的,是与机械自然观相对立的,可以包括万物有灵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等,或者用一个相对中性的词,称其为有机自然观。有机自然观中,世界是由生命构成的,这些生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没有任何物种可以脱离其他物种而独立生存,甚至整个地球生物圈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人只是地球上无数物种、无数生命之一。有了这种自然观,环境伦理必然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经济理论也同样会随之而变。

然而,机械自然观正改变其表述形式而顽固地占据着主流哲学的地位。今天的机械论自然观常常被表述为物理主义,它宣称,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物理的,物理的东西就是原则上可以被物理学所说明的东西,万物都是由基本粒子、场、反物质(或暗物质)等物理实体(physical entities)构成的。人就是由DNA构成的,人甚至就是180厘米长的DNA,它由包括碳、氢、氧、氮、磷原子的分子排列顺序组成(莱德伯格)。人类思维就是自然界最神奇的现象,但人类思维归根结底是由人脑及神经系统的物理运动决定的。物理主义与独断理性主义密不可分。当你断言自然界不过就是物理实体之总和时,你还会断言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可被科学所认识的,即自然界是完全可知的,你会进而相信,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人类将能越来越随心所欲地改造环境、征服自然,即人类将变得越来越自由、自主。你会认为,眼下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态破坏都只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暂时困难,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这些困难都可得到克服。你决不会认为,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决不会认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对。唯当你放弃机械自然观及其当代表述形式——物理主义时,你才会深深认识到,现代工业文明是



不可持续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至此,你才会认为,只研究人伦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伦理学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物乃至人与大自然(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你才会发现主流经济学是不值得景仰的,因为它长期误导了人类的价值追求。伦理学和经济学都必须实现其范式转换才能真正对人们有所裨益。

八、哲学与智慧

周国文博士谈了环境哲学与实践智慧的问题。周国文认为,走向生态文明的环境哲学所展现的是一种观念谱系的伦理智慧。环境哲学面对的是一个理念的道德世界与一个实质的物理世界。环境哲学的伦理思虑表现为一种德性护佑下的生态观念的永恒循环,它所阐发的实践智慧重在维护万物常在的生生不息。环境哲学的道德向度离不开对自然之思的审视,它关于于地理,衍生于人类,回归于世界,立足于生活,崇尚于实践,面向于社会。

海德格尔晚年编辑自己著作全集时曾写下这样一句话:“道路,而不是著作。”这句话大有深意。海德格尔的意思或许是,他留下的不是著作,而是一生求索的人生道路。环境哲学不应停留于哲学话语,而应成为法国哲学家阿多(Pierre Hadot)所倾心的“生活之道”(a way of life)。所谓“生活之道”即生活的道路,亦即与人的生命“不可须臾离”的实践智慧。学院派哲学家往往写出很多著作,而不是探寻生活的道路。一些人写哲学著作,只为晋升职称、获取奖项、博取功名,他们既不躬行自己阐述的观念、原则、原理,也不关心自己阐述的观念、原则、原理是否能影响大众观念和现行制度。他们是“以文辞而已者”(周敦颐语)。但环境哲学不可“以文辞而已”,而必须“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周敦颐语)。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不再“以文辞而已”,不再只是写哲学“著作”,而是探寻并躬行真正适于人类行走的“道路”时,哲学才无愧于智慧之学的称号。

以上是我就会议期间特别有感悟的八个问题阐述的个人见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会议讨论的问题不止于此,本文集所论述的问题也不止于此。我未提及的专家、学者们的文章也同样精粹、深刻,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2012年7月25日于清华园新斋

目 录

王小锡	序一/1
卢 风	序二/3
王小锡	略论经济自由/1
王建明	论经济 and 环境的共赢路径:企业生态责任建设/11
王露璐	经济正义与环境正义——转型期我国城乡关系的伦理之维/27
包庆德	评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37
卢 风	环境保护、非物质经济与价值观/49
田 松	自然观:环境伦理和经济伦理/63
乔法容	基于循环经济的生产伦理研究/70
孙春晨	经济学能做到“价值中立”吗?——基于弗里德曼观点的分析/78
华启和	气候责任:何种责任/87
陈泽环	经济应该由道德和政治来领导——试论钱穆的经济文化观/98
邝庆治	发展主义的伦理维度及其批判/108
周国文	走向生态文明的环境哲学:一种观念谱系的伦理智慧/118
郭建新	政府推动企业履行道德责任的有效路径/126
徐怀科 王国聘	技术的公正性及其与资本的关系研究/135
徐海红	论劳动解放及其生态转向/142
曹孟勤	从征服自然的自由走向生态自由/152

略论经济自由^①

王小锡

经济运行或企业经营的效果往往受到经济活动的自由度的影响和制约。发展经济或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需要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在当今新的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厘清自由、经济自由及其实现路径。

一、经典自由观与自由新视界

自由一词可谓是中外学术界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都会涉及的一个范畴,由于学科视角、生产生活环境、立场观点等等的不同,对自由概念历来有各种不同的阐释。对自由概念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实现。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由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与社会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在私有制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自由都是不平等条件下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中国经济伦理思想通史研究”(11&·ZD084)课题中期成果。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资助。